

民国学术丛刊·历史编

主编 叶隼 副主编 刘训练



王桐龄 著

中国民族史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王桐龄 著

中国民族史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出品人：周殿富
策划：国文创意
策划编辑：刘训练
责任编辑：顾学云 史宁
封面设计：未氓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民族史 / 王桐龄著. — 长春 : 吉林出版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2010.4
(民国学术丛刊)
ISBN 978-7-5463-2612-2

I. ①中… II. ①王… III. ①中华民族 - 民族历史
IV. ①K2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40353号

书名：中国民族史
著者：王桐龄
版：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址：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130021)
刷：北京振兴华印刷有限公司
本：650mm×960mm 1/16
张：40.75
次：2010年4月第1版
次：2010年4月第1次印刷
行：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址：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栋底商A222号(100052)
电话：010-63106240(发行部)
书号：ISBN 978-7-5463-2612-2
定价：70.00元

民国学术丛刊 总序

就中国传统之发展而言，清民之际乃是最重要的转型时代。这里的“民”不仅指狭义上的中华民国（北洋时代与南京时代又不同），也还包括了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帝制崩溃乃是一大转折，由此所开辟者非仅一朝一代之“更名换姓”，更具备我文明中国之步入现代世界的标志性意义。

虽然我们能看到的历史进程极其有限，但自清帝逊位、民国肇创之后，就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新纪元。毛泽东曾有意援用中华民国之名号，充分体现出其作为历史过程自觉者的伟人意识，可终究抵不过劝进者“开天辟地”的创新而最后重新更定国号。不过“民”之一字却始终未易，也可见出“清民易代”的长效性。

自1990年代以来，随着学术史意识的逐渐恢复，大陆学界对民国一代学术也给予了高度认同，除了编撰学案、结集成史之外，重印昔贤经典、接续学术传统，则为不可不做的重要举措。除了早期的“民国丛书”（上海书店）以影印本大批量推出各类代表性的民国著作之外，还有诸如“民国学术经典丛书”（东方、中

国社会科学等出版社)、“民国珍本丛刊”(团结出版社)、“六点学术·民国系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等;至于以民国时代为主要内容的,诸如“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河北教育出版社)、“旧籍新刊丛书”(岳麓书社)、“蓬莱阁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等。各类出版社的“书库”系列也多以民国名著为主,如“商务印书馆文库”、“三联精选”、“新世纪万有文库·近世文化书系”(辽宁教育出版社)等;而清点 20 世纪或中国现代学术也多半以民国主打,如“二十世纪学术要籍重刊”(云南人民出版社)、“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河北教育出版社)等;至于以“国学”为题的,亦然,如“国学入门丛书”(中华书局)、“二十世纪国学丛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等;至于还有所谓“近人学术述林”(浙江人民出版社)、“大家小书”(北京出版社)等可谓不胜枚举,比比皆是。在这种背景下还要推出一套“民国学术丛刊”的意义究竟何在?

总体来说,随着 20 世纪初之废科举、兴学堂的“霹雳手段”,到了 1910 年代民国肇创后的办教育、立学术,基本已是“题中应有之义”,并未掀起绝大波澜。所谓“民国学术”也就是中国现代学术创立、发展时代的学术状况。虽然这段时间前后不到 40 年(1912—1949 年),但其所产生的丰硕学术成果却不容小觑。就此而言,重刊旧籍,其意决非仅是“旧物利用”;它更指向“重温历史”,意味着我们如何重新认知“昨日”、资鉴“历史”、确立“坐标”、走向“明天”。也就是说,我们一方面固然要充分利用“学术祖辈”的丰厚遗产,另一方面更需要有在历史行进过程中不断与“传统”进行对话的自觉意识,这个传统不仅包括中国文明的悠久典籍与先贤智慧,也理应关注在现代性转型过程中确立典范的“中国现代学统”。而在学术史意识之初的“回归学统”之外,也要有能力在宏观审视世界现代学术发展的背景中从容反省,

我们的学术前辈在传统崩裂、现代初萌、一切仿佛开天辟地的时代里究竟达到了怎样的高度,又留下了怎样的缺憾和距离?在某种意义上,他们那代人既要为中国现代学术初期之成就定尺度,也要为中国在世界现代学术谱系中争位置,可谓“重任在肩”。就此而言,出版这套“民国学术丛刊”也还有编选者、导读者、出版者自身的学术寄托。

相比较时贤的“文字飞扬”,这些尘封在故纸堆中的民国旧书自也有其“晦涩艰深”的一面。这不仅是说文字的易代不同、学科的自然演进、关怀的时代语境等等,也还有“今人”与“前辈”的价值取向、文章风格乃至世道人心之间难以避免的缝隙和差距,故此,我们也希望能借助大家的导读,以高深学问而作浅近文字,借助生花妙笔的华彩章句,使得“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在我看来,或则可把至今仍在进程中的中国现代学术发展历程,分为三段六代人。就时段来看,可以分为三段:1912—1952年;1952—1992年;1992—2030年前后。本丛书涉猎范围,基本上是第一阶段和前三代人。第一阶段可谓“黄金时代”,虽政治变动频繁、战争此起彼伏,但学人仍作出了相当出色的成绩;第二阶段基本属于荒废和接续时代,1990年代以后的学术史自觉意识的确立才真正接续了原有的现代学术传统;就第三个阶段来说,中国现代学术才刚刚开始不久,仍在进程之中。在这个阶段里,我们是否能拿出“过硬”的成绩来,对于“中国崛起”至关重要。因为,一方面是条件基本具备。当此时代,学术史意识已成常识;全球化趋势已大势所趋;电子信息化的应用也都相当普及。中国现代学人可以基本在同一个平台上,面对西方学者,挑战和机遇并存。关键在于,我们怎么去做?另一方面,国

家之发展需要学术的进步、思想的创生。撒切尔夫人不无傲慢地宣称,中国崛起不足为虑,因为任何一个大国都不可能只输出物质产品而没有精神产品;在她眼里,中国根本就没有什么原创性的文化产品可言。未来的二十年左右的时间,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关键期。而最关键的,则是中国的大脑,作为学人的学术与思想,因为他们将成为中国前进的灯塔。故此,学人之承担国运之责任也不可谓不重。当然,这里重点关注的仍是民国,将其定义为狭窄的概念之内,即传统上的 1912—1949 年间。虽然就长时段眼光观之,这短短的 37 年间实在不过“白驹过隙”,可其中孕育的学术生机可能,却确实是“浩浩然大哉”。

就代际变迁来看,可分六代人。原生代(即介于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过渡一代人),以沈曾植、罗振玉、章太炎、王国维、梁启超等为代表,他们多半在 1870 年前后出生,在传统学术方面造诣深厚,部分学人又借助留东(日本)之便,而得以窥见西学门径,乃是传统学术的终结者与向现代学术转型过程中起到“承前启后”作用的一代人;第一代,1890 年前后生人,以陈寅恪、胡适、汤用彤、吴宓、郭沫若、冯友兰、朱光潜等为代表,他们多半具有良好的国学修养,并得时代之机遇而能留学西方(主要是欧美,但如陈垣、钱穆等未留学),不以求学位为终极目标,在五卅前后留学归来,对于中国现代学术的创立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颇多人集中在北大、清华这两大重镇;第二代人,1910 年前后生人,以钱锺书、费孝通、冯至、季羨林等为代表,他们仍具有一定的旧学基础,但除极少数外已难与前代人比肩,多半在抗战前后留学归来,获有博士学位,倾向专门之学,以外国做研究对象者不少,他们对中国现代学术发展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并对 1980 年代后的学术薪火传承有重要意义;第三代人,1930 年前后生

人,以李泽厚、庞朴、叶秀山、谢冕、刘再复等为代表,他们多半在一种救亡与革命的时代背景中成长,多半没有留学机会,学术训练与知识积淀都有先天不足,但具备很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以及自学成材的能力,部分学者能利用特殊的时代境遇仍作出了引人注目的学术成就;第四代人,1950年前后生人,以葛兆光、陈来、陈平原、桑兵、汪晖等为代表,他们多半是“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或研究生,有机会到国外进行学术研究,接触到西方的学界状况,部分人也攻读了学位,并借助改革开放和中国发展的东风,形成了自觉的学术史意识,重新接续了中国现代学术的传统,较之前代学人明显有突破,积累了相当的学术成绩,是目前学界的领军人物;第五代人,1970年前后生人,这代人基本尚在形成之中,他们是第四代学人的弟子辈,同时又与第三代学人产生某种“亲密接触”。当然,这样一种划分不是绝对的,它的特征概括也只是相对而言,其目的是为理解民国学术提供一种参照系和整体学术地图坐标。

民国一代学术,主要是第一、二代学人的学术空间。当五四一代以一种“元气淋漓”的激烈方式而确立起自己在学术、文化场域的主导性占位后,后五四一代当然深受影响,纷纷漂洋过海,学习师辈的成功经验,立志“为中国文化寻路”;在1930年代后期,他们的弟子辈多半放洋归来,成为抗战建国年代中国学术发展的生力军。尤其是西南联大的熏陶下,可谓成就了“两代学人”的精彩共舞时代,中国现代学术不但开创了极为辉煌的“事功年代”,且不说自然科学家如华罗庚、陈省身、周培源、吴大猷、曾昭伦等人的成就,就列举一下人文学者的著作吧!冯友兰的《贞元六书》、闻一多的《神话与诗》、金岳霖的《知识论》、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钱锺书的《谈艺录》、潘光旦的《优生

与抗战》……正所谓“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西南联大纪念碑文）。

当前辈学人的学术史勋绩以如此绚丽、厚重甚至不乏悲壮的方式集中呈现时，他们坚守“书斋”的努力和“纸上苍生”的努力，就不仅是一种资源，一种能被后世学人再生利用的宝贵学术资源，而且也自然形成一种坐标，一种后代学人可以由此出发、寻得自己精神安身立命处的“大学术”！这样一种坐标，或许还不能给我们在市场经济中苦苦支撑的纯正学人以实在的“物质支援”，但朱自清先生拒绝美国救济的选择，却仍有那样一种无言的力量。这样一种坐标，其实传递给我们的，更是一种传统，一种中国学术积淀千载、现代重生，完成转型之后又规定未来民族血脉的纯正学统。这，才是最值得发覆的一层含义。

相比较原生代人的元气淋漓、第三代人的先天不足、第五代人的行进之中，那么，目前最能代表中国现代学术创造实绩的，是第一、二、四代人的学术成绩。尤其是作为承上启下、接续学统的第四代人，他们可谓“后来居上”，已经贡献出了相当不凡的学术成绩，而且在著述的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不凡的表现。诸如葛兆光《中国思想史》2卷、汪晖《现代中国思想之兴起》4卷、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桑兵《国学与汉学》等皆堪代表，相信不但可以“藏之名山”，亦确可“传之后世”。但恐怕不得不承认的也是，在第四代学人中确实尚未出现如陈寅恪、钱锺书那样横贯而通的大家人物。

民国一代学术，开启中国现代学术的纯正源头，其功用也不可谓不大。希望我们这些来此探胜者，不要采玉宝山，空手而还。重温第一、二代学者的学术史贡献，不但可以使我们借鉴学

习前人呕心沥血的资源宝藏,而且更可以重温激情岁月的开创时代的学人精神。通过民国学术的重要成就的梳理和重版,我们希望能再现那代学人的“岁月峥嵘”。无论是在文史哲等人文领域的“确立典范”,还是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方面的“发凡起例”,我们看看著作的题名和作者的立意,就知道在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领域前贤曾达到了怎样的高度,曾确立了一个如何辉煌的起点?本丛书虽然没有严格的学科划分,但却并非不具备学科史的基本眼光,邀请的导读专家就是从这样一个层面考虑。而在一般意义的学科划分系列之外,又特别增辟了“海外博士论文”系列与“学术研究译著”系列。前者希望借助民国学人在留学时代的精彩创发,让我们一窥兼采中西之后的学术规训之作究竟可以达到怎样的一种层次,虽然其撰写语言并非中文,可这毕竟也是中国现代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后者则借助学术父辈们资鉴他山之玉的具体成果,希望不仅能将他们呕心沥血而移玉东来的学术译著化为今日后辈负重前行的重要资源,更期待藉由此一窗口展现那代学人胸怀天下的“世界学术”之整体认知。敬请读者关注。

陈寅恪先生曾批评当时的中国学界谓:“国人治学,罕具通识”(《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他这是以世界学术的眼光来衡量正在创立期的中国现代学术,其批评不可谓不严厉,其言辞则不可谓不中肯。吾辈或可加一句,“有之,自寅恪先生始”。作为中国现代学者第一人,寅恪先生强调“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他不但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确立起关乎中国现代学术根本的价值观,为后世学人之立精神;更以治学态度的“通识观”确立起学人微观层

面可以依循的伦理观。而中国现代学术的未来发展若能建立在这样一种“通识意识”、“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基础之上,则中国现代学术之于世界学术的位置,或可有所希望哉!是为序。

叶隽

2009年4月16日—6月15日

作于北京—欧行旅次之柏林,改定于7月26日北京

读王桐龄《中国民族史》^①

马戎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

在鸦片战争及随后的几次与西方列强之间爆发的战争中，当年一度雄视东亚、以“天朝上邦”自居的大清帝国被证明是如此不堪一击。在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不平等条约后，中华帝国的统治者和精英们必然要思索中国未来的出路，以应对“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和以中原皇朝为核心对周边部落施以“教化”的“文化中心主义”，现在不得不接受西方“民族国家”的概念和外交游戏规则，自觉或不自觉地走上一条现代意义的“民族构建”(nation-building)之路。

当时列强从各个方向积极蚕食和瓜分这个古老但腐朽的东方帝国，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清朝政府在这一紧迫态势下也不得不自己的有效管辖地域内加紧进行政治整合和人口布局，

① 本文初稿刊载于《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第125—135页，此为修订稿。

如开放对东北移民的限制和内蒙古“放垦”来“移民实边”，赵尔丰在川边的“改土归流”，联豫和张荫棠在西藏推行的新政以及西北新疆的建省。清朝不得不从中华传统的“核心行省”向外行政管辖与控制逐层减弱的“内强外弱”的模式转变为优先加强最外环控制的新模式。

与此同时，中国的精英们也开始接触到了源自西方的“民族”(nation)概念，并尝试把这一概念试用于中国。“中国”或“中华”是不是一个“民族”？中国境内的汉、满、蒙、藏、回各部应当被视作各自不同的“民族”还是属于“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如果满蒙等被称为“民族”，那么中华是否应被称为“国族”？这些在清末民初都曾是人们反复讨论并存在很大争议的问题。

辛亥革命后，清朝皇帝退位，建立了“中华民国”。但外蒙古和西藏都表示了独立的愿望，各地军阀割据也使新生的民国充满了变数。中国周边局势极其复杂纷乱，中国如何在这样的乱局中构建一个“民族国家”，便成为当时社会精英们最为关注的问题。也正是在这样的国情态势下，如何从历史的角度把中国境内各部族的起源演变和相互关系的发展过程梳理出一个头绪，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为中国努力建立一个新的政治实体提供理论基础，便成为当时学者们最为关注的问题。也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文化学社 1934 年出版了王桐龄先生的《中国民族史》，同年世界书局出版了吕思勉先生的《中国民族史》，随后商务印书馆 1939 年又出版了林惠祥先生的《中国民族史》，在短短几年内连续出版关于中国民族史研究的系统专著，说明了当时中国人对于“中华”政治实体应当如何建构以及它的历史合法性的关注。

在阅读了这三部《中国民族史》后，我觉得王桐龄先生的《中

《中国民族史》在思考中国“民族构建”的框架方面是最有意义和最有价值的。该书原计划共分为上下两编(“内延史”和“外延史”),分别叙述“中国民族对内融合事迹”和“中国民族对外发展事迹”。20世纪90年代上海书店编印《民国丛书》时,王桐龄先生的《中国民族史》的“内延史”部分与吕思勉先生的《中国民族史》(1934年世界书局出版)同编入该丛书的第一编第80卷(历史、地理类)影印出版。而王先生的下编“外延史”在1934年后是否出版,则不得而知。

值得注意的是,吕思勉先生的《中国民族史》和林惠祥先生的《中国民族史》在近年曾先后出现了多种单行本,与之相比,王桐龄先生的《中国民族史》却始终没有出版单行本,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从20世纪初叶中国努力构建一个“民族国家”的角度来看,我认为王桐龄先生的《中国民族史》是一部极为重要的研究文献。通过阅读和理解这本书的核心概念和叙述思路,将有助于我们了解30年代“中国民族”研究中非常重要但被今天的人们所忽视的一派观点。本文将主要介绍和讨论王桐龄《中国民族史》一书的内容和它的学术意义,同时在讨论中我们也将参考吕思勉和林惠祥两位先生所著的另两本《中国民族史》,并努力把这三本书的特点进行比较,同时思考这三本书对于我们今天中国的“民族”研究和族群关系研究能够带来怎样的启示。

一、如何理解中国各民族的构成

1. 中国各族都已经成为血缘混合的群体

王桐龄先生这本书的一个最核心的观点,就是认为中国各

族经过了几千年的相互交流与融合,实际上都已经成为血缘混合的群体。“实则中国民族本为混合体,无纯粹之汉族,亦无纯粹之满人。”(王桐龄,1934:序1)这个观点得到林惠祥的支持,“今日之汉族所含成分尽有匈奴、肃慎、东胡、突厥等,……今日之汉族实为各族所共同构成,不能自诩为古华夏系之纯种,而排斥其他各系。其他各族亦皆有别系之成分,然大抵不如华夏系所含之复杂。”(林惠祥,1993a:40)针对部分闽人的观点,他特别指出“我福建人若坚决必为汉族之纯种而以族谱之记载为证据,是真为固陋而自欺。”(林惠祥,1993a:122)费孝通教授亦特别指出,“在看到汉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大量吸收了其他各民族的成分时,不应忽视汉族也不断给其他民族输出新的血液。从生物基础,或所谓‘血统’上讲,可以说中华民族这个一体中经常在发生混合、交杂的作用,没有哪一个民族在血统上可以说是‘纯种’。”(费孝通,1989:11)

人们现在逐渐开始接受汉族是族群混合体的观点,但是对于其他各少数民族群^①是否也是族群混合体,意见并不一致。而王桐龄先生则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把这些少数民族群也都明确地视作为“混合体”,而且认为甚至在远古时代,这些族群就是不同“民族”的混合体,如汉族在其“胚胎期”是四支部落(炎帝、黄帝、周、秦)的血缘混合体,而春秋战国时期的“獯鬻”则是通古斯和蒙古两支血统混合后变成的一种“新民族”(王桐龄,1934:19)^②。在他眼里,看到的主要是各族之间的“同”而不是“异”,

① 我主张把“中华民族”称为“民族”,而把“少数民族”改称为“少数民族群”(马戎,2001:156)。

② 当然,这些具体观点都是可以商榷的,因为“通古斯”和“蒙古”都是在以后历史时期出现的族称。

看到的主要是中国境内的这些族群在几千年的发展进程中是如何越来越相互融合与“趋同”，看到的是分散的各个族群逐渐融入到邻近的强大族群当中，逐步整合到几个主要的大群体当中，看到的是一个一个曾经很强悍的族群支系，如何一步一步地进入并消失在中华民族的主流汉族之中。

2. “中国人民”为汉满蒙回藏苗六族混合体

当王桐龄在中国民族总集合体这一层次上进行分析时，他提出“中国人民为汉满蒙回藏苗六族混合体”这一观点（王桐龄，1934:669），这与目前关于“中华民族”由 56 个民族“组成”的流行观点，并不完全相同。“混合体”与“组合体”是不同的范畴。在目前 55 个少数民族群中，有些族群（如满族、回族等）从整体上在地理分布和血缘方面与汉族已经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混合”，有些族群（如蒙古族等）其人口相当大的一部分也处于这种“混合”的状态之中。20 世纪初叶，中华各族之间经过千年的迁移和通婚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之间存在着血缘与文化的融合，是不可分割也不应分割的。王桐龄分析中国族群关系发展历史的这个视角非常值得我们注意，也是今天我们理解中华各族之间关系最重要的一个观点。

但在 1949 年建国以后，由于政府开展的“民族识别”工作和后来户籍中“民族成分”的登记制度，加上政府和学校在“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教育中一直宣讲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共同文化和心理认同），宣讲列宁的“民族自决权”等观点，我们必须承认，中国各族群之间的界限和“民族”意识比起 20 世纪 30 年代来是大大地清晰和强化了。近半个世纪里的这一演变趋势显然与我国两千多年来的族群关系发展中相互融合的大主流背道而驰。历史上中华各族相互融合的

总趋势,不仅反映在中国所有历史文献典籍的记录与评论之中,也明确地反映在 30 年代这几部中国民族史的研究著作中。

3. 对“民族”的应用定义一词缺乏界定

我们也注意到,王桐龄的这本书在使用中文“民族”一词时,对其来源、含义并未做任何讨论。同时,在书中讨论中国历史上各族群变迁时对所使用的术语“族”、“民族”、“中国民族”、“部落”等也没有做任何界定,所以在全书行文中出现了五种称呼:一是直接沿用古代典籍中的称呼如肃慎、鲜卑、匈奴,在后面不加“族”甚至也不加“人”;二是使用 18 世纪以来中国对于族群常用的称呼,称之为“××人”(如汉人、匈奴人、回纥人、狄人、藏人);三是在族群名称中冠之以“族”(如汉族、西藏族、满族);四是把各族称之为“民族”(如“各民族”、“苗族……不开化之民族”,“一支民族……史书上称之为东夷”,“瓯越民族”,“北方民族——狄”)(王桐龄,1934:5,11,15,18);五是在笼统谈到中国各族群时又统称为“中国民族”。以上五种称呼在全书中交错使用,甚至不同称呼出现在同一段,同一句话中(如“荆人之分布在湖北,……湖北民族始完全同化于汉族”)(王桐龄,1934:13—14)。由此可见,作者并没有把族群称呼的标准化和区别界定当作一个问题予以关注,在吕书、林书中亦存在类似情况。

在 20 世纪 30 年代,斯大林民族理论和民族定义虽然对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有较大影响,但对当时中国主流学术界的影响十分有限。王桐龄等几位学者对于“民族”、“族”这些术语的模糊性使用,反映出中华文化对于族群之间的界限看得比较模糊,而具有从融合与演变的角度看待族群发展的思想传统。同时,当时大量西方社会人文著作经日文译本进入中国,西方文本和日本文本中对中华各族有时使用“民族”(如蒙古民族、满民族